

新中国新闻史丛书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中国电视史

1958—2008

A History of Chinese Television: 1958—2008

常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电视史

1958—2008

A History of Chinese Television: 1958—2008

常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视史：1958—2008/常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  
(新中国新闻史丛书)

ISBN 978-7-301-29073-6

I. ①中… II. ①常… III. ①电视事业—文化史—中国—1958—2008  
IV. ①G22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4991 号

- 书 名 中国电视史：1958—2008  
ZHONGGUO DIANSHI SHI：1958—2008
- 著作责任者 常江 著
- 责任编辑 徐少燕 (shaoyan\_xu@163.com)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073-6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31.5 印张 500 千字
-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7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丛书弁言

这套“新中国新闻史”丛书，缘起于200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的重点项目“新中国60年新闻事业史研究”。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申报并获批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2015年陆续付梓。丛书中所论“新闻业”，除了指涉新闻传播领域，还兼及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

丛书主编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丛书依托的国家项目展开前曾经举办研讨会，得到中央党校教授李书磊，清华大学教授郭庆光，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潘维、程曼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陈力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等悉心擘画。

先后以不同方式介入这项工作的学者有：吕新雨教授、陈昌凤教授、刘海龙教授、王维佳副教授、陈彤旭副教授、林溪声副教授、王辰瑶副教授、黄卫星副教授、马学清副教授、涂鸣华副教授、王华副教授、常江博士、姚遥博士、吴风博士、关琮严博士、张垒博士、沙垚博士、张斯琦博士等。

迄今为止，项目及其丛书已经成就三篇博士论文（其中一篇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陆续发表数十篇专题论文，包括《南京社会科学》与《山西大学学报》两组笔谈，有的已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完成或汇聚了数部学术专著，除已纳入丛书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还有因其他缘故“花落他家”者，包括姚遥博士的学位论文《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作为第一套关于新中国新闻业的系列图书,丛书一方面尽量吸纳前人成果,另一方面力图在多学科、新视野、全球史的视域中,审视六十多年来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希冀为中国道路的新闻传播及文化政治开辟新的理论空间,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传播学科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权。是所为盼,谨此告白。

2015年10月

# 序 一

刘彦彦

常江博士这部《中国电视史：1958—2008》的问世，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是因为距离第一部对中国电视业发展演进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术著作，即郭镇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付梓出版以来，我国已有近30年无人从事中国电视史的总体性研究。在这3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电视业也早已一改最初平实、朴素的面貌，而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文化产业和深深嵌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第一媒介”。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视史的总体性考察和阐释的缺失，始终是我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遗憾。常江的这部专著适逢其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

在我看来，常江的这部著作主要有三个显著的特色。第一，扎实的史料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史料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互联网时代，对信息的获取变得极为容易，因而历史研究，尤其是当代史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已由过去的资料匮乏转变为如今的资料过于丰富、真伪莫辨。历史研究者需要在海量的信息中沙里淘金、去芜存菁，这不仅意味着浩大的工作量和时间成本，而且对研究者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本书的成文来看，常江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是值得肯定的，其掌握的资料不但涵盖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几乎所有类型的文献，而且在对重要数据和信息加以使用的时候，也非常重视对不同来源的文献加以比照

和判别,这使得这部著作在对历史进行精确还原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借鉴。本书是我国出版的新闻传播史或媒介史著作中,为数不多的对主流、前沿社会科学理论加以借鉴,以实现在更深刻的维度上对历史进行考察的作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使用是适度的,是以揭示历史、阐释历史为最终目的的,因而避免了理论“喧宾夺主”的情况。这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学者广阔的国际视野和跨学科优势。具体而言,常江借鉴话语分析的框架,归纳出了中国电视业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即纪实、审美和控制三套并行不悖、交相影响的主导性话语。这是富有创见性的,对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性的。

第三,娴熟而流畅的叙事。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占有足够的资料,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对历史规律做出归纳和解释的理论根基。但历史终究是要讲出来、写出来的,如何将历史过程中的千头万绪以清晰、准确、朴实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同样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常江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报刊评论和纪实作品创作经验,更出版过如《再见巴别塔》这样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的新闻作品,其叙史工作文风严谨、结构得宜、表述流畅,读来没有枯燥晦涩之感,这对于本书的传播和接受而言,将大有裨益。

常江博士多年来深耕中国电视史研究这片学术园地,他的很多成果相继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学研究》等海峡两岸的中文权威期刊上;他甚至在西方权威英文学术期刊《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上发表了迄今为止唯一一篇以英文撰写的《新闻联播》专项研究论文。这些成果提升了中国电视史研究在国内外主流学界的“能见度”。因此,在对本书加以推荐的同时,我也希望常江博士这部著作的出版和传播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未来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才俊加入中国电视史研究者的行列。无论是在大众传媒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电视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对电视史的研究越丰富、越多元,我们对于当代社会的理解也会越深刻。

# 序 二

郭镇之

拿到常江的这本《中国电视史：1958—2008》，说实话，有点意外——在我印象中，他是偏理论的路径，而且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好莱坞电影。虽然影视一家，史学的研究路数也接近，但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还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不由得想起30年前我做博士论文(当时名为《中国电视史稿》)的情形。与现在资料的泛滥、搜索量的超载不同，当时研究电视史，发愁的就是——资料极少。1985年的时候，中国电视已经走过二十多年，但还处于“羽毛未丰”的欠发达阶段，录像技术刚刚引进，尚无留存“历史资料”的意识，加上之前“文化大革命”险恶的政治环境和“翻烧饼”似的政治变化，文字记录也湮灭殆尽。那时的广播电视部(我做博士研究时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档案室是我常去的地方。还记得，好不容易发现一点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开播时的资料，自己欣喜若狂的样子。由于文字资料不足，我的博士研究主要立足于采访，那时感觉电视台的人——特别是头头脑脑——我都认识似的。访谈得来的资料虽然生动鲜活，但准确性有一些问题。当时又没有谷歌、百度可以随时搜索查证。还好，因为“盛世修史”的需要，广播电视系统正在编写《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当时抽调了不少干部为这部广播电视的“正史”搜集资料，准备文稿。于是，我成了编写组和后来的编辑部办公室的常客，翻阅了多次资料性初文稿：初稿、二次稿、三次稿、送审稿、修改稿，等等。这些资料性文稿经过删减，越改



越薄，其中很多丰富的细节都未能进入那上下两册的官方版本，但它们奠定了我认识中国电视现象的基础。后来，在博士论文出书时，“史稿”一词被认为“不正式”而删去“稿”字；同时，大多数注释也因为来自档案和未出版的资料文稿，不符合当时的出版规范，而被尽行删除。但我深感幸运的是，我赶上了电视最初的嬗变和腾飞，那是个非常宝贵的阶段。特别是，当时有限的资料还在个人容易把控的范围，就“穷尽所能，搜集到全部资料”的要求而言，内心感觉比较踏实。

常江现在要做的，却是相反的工作——他要从汗漫无边的资料中爬梳整理，才能够理清已然十倍、百倍于30年前的电视行业资料。这种工作量巨大无比。说实话，我佩服常江的勇气。不少人后来曾建议我重写《中国电视史》，在止于1988年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为大发展的中国电视进程重做一番全面详细的扫描。但我面对当今电视这个庞然大物，深感力不从心。因此，我很高兴常江能够承担起继续研究中国电视史的重任！

作史是独断之学。虽然中国向来提倡举国体制，以集体之力做大项目，但由行政机构组织集体项目写出来的官修历史，很难做到观点、逻辑和风格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赞赏常江的个人努力。

历史也有多种写法，有偏重人文学的叙事史，有偏重概念和逻辑的概述史……记得在写博士论文时，一位做电影史的朋友问我：“你的理论框架是什么？”我回答不出。后来与导师方汉奇教授讨论，我说：“既是博士‘论文’，是不是还是应该以理论来结构呢？”方老师并不赞成，他说：“黄天鹏的《中国新闻史》就是他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呀。”我后来才想通，叙事史的理论思考是隐含在叙述中的。我在写《中国电视史稿》时，其实一直都有一种政治与电视互动的思路，而在那个时代，明显地是政治在指挥电视的运行。这是论文的隐性逻辑。

常江的写法与我不太一样。常江并不致力于史料的发现和史实的考订，而更注重历史的解释和观点的阐述，他是有明确的理论框架的。他将电视传播看作一种“话语”，以“纪实”“审美”“规训”的思路来整合资料，显然比我当初的“政治性”思路来得开阔。在时间紧迫的个人著述中，这种

以观点带动论述的做法无疑比较讨巧——因为它重在对历史的看法，不必拘泥于历史本身。这个历史对象现在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

实际的情况正是如此。电视的内容在1988年后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30岁的电视才刚刚开始“自己走路”；短短20年间，电视已然成为中国大众传播的第一媒介；电视在仍然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结构中，也以强大的整合力量对社会进行引导和规范，电视给予社会包括政治的反作用力日益明显。虽然以“央视”为代表的电视行业常常遭人吐槽、奚落，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毋庸置疑。顺便说一句，在我写论文的时候，还没有“央视”的叫法。面对两个“中央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中央台”的称呼常常让人无所适从。后来，百姓口中“央视”的流行，催生出一个“央广”的称呼，“中央台”从此退居幕后。称呼象征着权力和地位，这也是一种话语。话语确认地位，话语赋予权力。当年永远排在老四（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和在广播电视界总是屈居老二的中国电视，如今财大气粗。就社会影响而言，不知从何时开始，它已经把大哥们甩到后面了。30年弹指一挥间，人世间却是沧海变桑田。

拉拉杂杂写了一些感想。应该说，常江的三种“话语”的思路是有一定新见的。他以简约化的思路对中国电视50年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有意思的归纳。对常江的书，人们自可判断成色。但我认为，一名青年学者以个人的独断之力承担这样一份艰巨庞大的任务，十分难得。我祝愿常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始终保持积极探索的心态，以不懈的努力为电视及其他传媒的历史研究继续做出卓越的贡献。

# 目 录

导言 关于中国电视史 .....	1
第一章 迟来的新生:1958—1966 .....	7
一、电视诞生的社会背景 .....	8
二、早期电视节目 .....	40
三、早期电视的机构形态 .....	82
四、总结:初创期的经验和遗产 .....	88
第二章 政治的孱弱映像:1966—1976 .....	92
一、政治运动影响下的电视业 .....	93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视节目 .....	109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视机构 .....	129
四、总结:动荡、倒退与分裂 .....	132
第三章 新时代的先声:1976—1982 .....	136
一、电视业真正崛起 .....	138
二、转型期的电视节目 .....	152
三、转型期的电视机构 .....	194
四、总结:至关重要的转承 .....	196
第四章 生逢其时的黄金时代:1982—1990 .....	198
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电视 .....	200
二、节目形态的全面成长 .....	240

三、电视机构的扩张和初步产业化 .....	284
四、总结:未来从这里开始 .....	287
<b>第五章 全面拥抱消费文明:1990—2000 .....</b>	<b>289</b>
一、电视业的产业化与国际化 .....	291
二、节目形态日趋成熟 .....	315
三、技术驱动的行业格局变迁 .....	371
四、总结:宏伟的转型 .....	377
<b>第六章 点燃大国之梦:2000—2008 .....</b>	<b>380</b>
一、新世纪的新状况 .....	382
二、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 .....	409
三、全国电视业格局的固化 .....	458
四、总结:终结,还是走向重生 .....	460
<b>结语 纪实、审美、规训:中国电视史的话语逻辑 .....</b>	<b>463</b>
一、纪实的话语 .....	464
二、审美的话语 .....	466
三、规训的话语 .....	467
四、写在最后 .....	469
<b>参考文献 .....</b>	<b>472</b>
<b>索引 .....</b>	<b>486</b>
<b>后记 .....</b>	<b>491</b>

## 导言 关于中国电视史

纵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人类历史,恐怕没有什么比电视对人的日常生活嵌入更深、影响力更大。长期以来,人们以电视机为中心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以热门电视节目的内容作为人际交往的谈资,甚至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将电视荧屏上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混为一谈。总而言之,“电视在弱化文化的隔绝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作为一种文化容器,电视同时对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诗学、美学乃至哲学的传统进行着颠覆和重构,并最终塑造了人类历史迭代中极为特殊的“电视世代”。这个世代在美国通常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ers)相重合,在中国则大约对应着出生于20世纪70—90年代的庞大群体。这些人伴随着电视的繁荣时代出生、成长,在电视的影响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集体记忆和思维方式,并最终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sup>②</sup>正因如此,对电视及其历史的考察便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电视史的解释,其实是对于过往半个多世纪的人类社会进程、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进行系统性解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电视史,顾名思义,就是电视媒体与电视行业发展演进的历史。在新闻传播史和媒介史研究的范畴中,电视史始终占据着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是在华语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针对电视史的系

---

<sup>①</sup> Lyn Gorman and David McLean, *Media and Society into the 21st Century*,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p. 171.

<sup>②</sup> Cheryl A. Casey, “Let the Games Begin: Baby Boomers, Capitalist Ideology, and the Containment of Gender in Sports Television,” in Brian Cogan and Thom Gencarelli (eds.), *Baby Boomers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quiry into America's Most Powerful Generation*,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5, pp. 85—104.

统研究却始终屈指可数,甚至是一个时常受到忽视的领域。<sup>①</sup>在国内,中国电视史最为重要的开创性研究由郭镇之完成,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中国电视史》于1991年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她第一次赋予当时远谈不上成熟、富庶的中国电视事业以文化上的独特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脉络中长期以来的“广播电视”并提、将电视视为广播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思维方式。但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前,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是唯一一部中国电视史学术专著。除此之外,还有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该编著资料汇编色彩较强,其学术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均不可与郭著同日而语。

与当下针对中国电视史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匮乏现状相对的,是关于中国电视业的史料和文献的极大丰富。大致看来,这些史料散见于如下七类文献中。(1)官方资料汇编,如《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央电视台年鉴》《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史》,广播电视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的电视台》与《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写的《电视剧研究》,以及各省市编撰的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等。(2)相关领域学者的新闻史或广播电视史专著与编著,包括某些电视节目类型的专门史,如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陈昌凤著《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周翼虎著《中国传媒超级工厂的形成——中国新闻传媒业30年》、夏之平著《我国早期的电视新闻》、赵玉嵘与陈友军编著《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岳淼著《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何苏六著《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许婧著《中国电视艺术史》、仲呈祥和陈友军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Ying Zhu 著 *Television in Post-Reform China*, 以及散见于中英文学术期刊的大量电视史研究文章等。(3)流行媒体和专业电视杂志刊登的行业报道、读者来信、评论文章,尤其是《大众电视》《当代电视》《中国电视》《中外电视》《电视研究》等在特定时期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电视杂志上出现的各类资料性和观念性内容,以及不同时期的从业者、批评家、普通观众围绕电视行业与电视文化中的焦点问题所展

<sup>①</sup> Erin Bell and Ann Gray, "History on Television: Charisma,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in Helen Wheatley (ed.), *Re-viewing Television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Television Histor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2008, p. 182.

开的讨论。(4) 当事人口述资料及回忆文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播电视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上海音像资料馆编《老电视人口述历史》、孙玉胜著《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徐泓编著《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虹,我们听你讲》,以及散见于各类专业期刊与报纸上的电视从业者访谈与回忆文章。(5) 其他现代历史著作、文集与文献汇编中与电视有关的内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家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政策研究所)、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等。但这些资料中系统性描述电视的内容并不多,只是零星地涉及。(6) 不同时期调查机构与研究者发表在学术或行业期刊上的相关研究成果或调查结果,尤其是收视率统计、受众调查、节目内容分析、产业数据统计与分析、机构情况调研,等等。(7) 借助互联网获得的早期代表性电视节目视频资料,尤其是电视剧、新闻片和纪录片的资料。

上述文献内容繁多、类目庞杂、来源广泛、信度不一,但它们对于全面理解、深刻阐释中国电视业发展变迁的规律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今天从事中国电视史的研究,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相比有了巨大的优势和便利,那就是资料的无比充裕,乃至浩繁;但相应地,也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巨大困难,那就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完成删繁就简、去芜存菁的工作,突破无效信息、重复信息乃至错误信息营造的迷雾,以尽可能清晰的线索和凝练的叙事,厘清中国电视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解释电视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互构关系,并在整个中国当代史演进的脉络中为电视锚定一个准确而稳定的位置。

从时间跨度上看,本书考察的是中国电视业诞生后头 50 年的历史。中国电视自 1958 年诞生,至今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但如果从研究和叙事的完整性上看,以 2008 年作为研究年代的止点似乎更为科学。这是因为,尽管至今为止,电视仍然是中国受众人数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广泛、产业规模最大的媒介形态,但电视的这种强势地位是从 2008 年之后开始呈现较为显著的衰微之势的。从 2009 年开始,电视业无论经营收入的增速、观众的数量与忠诚度,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均受到新兴的互联网媒介的全面挑战。因此,将 2008 年设置

为研究和叙事的止点,有将对中国电视史的考察局限于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演进模式之下的考虑。

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附加的考虑,那就是与研究对象保持批判性距离(critical distance)的必要性。<sup>①</sup>一方面,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对于过于晚近的历史,甚至正在进行中的历史,研究者很难做出足够理性和清醒的判断,因此历史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应十分注意自身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既包括时间的距离,也包括心理的距离。另一方面,从资料获取的一般规律来看,由于文献记录与保存技术的限制,显然距离研究者越近的历史时期,资料越丰富,也越容易获得;反之,越是久远的历史年代的资料,由于种种技术、政治或人为的因素,越是难以获得。但凡事都是相对的,尽管获得晚近的资料具有更佳的便利性,可这些资料由于缺乏交叉验证所需的必要的时间和沉淀而难免在有效性与可信度上存在问题。而且,从事电视史研究有一项天然的劣势,那就是它所需要的最直接的资料——电视节目本身——一旦完成了在电视上的播出,便很难再从各类公开的平台上去获得。因此,与书籍、报刊、互联网等其他媒介形态的历史研究相比,电视史研究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依靠亲历者的文字记录、转述、回忆、评论等书面材料来完成,因而确保这些材料能够被交叉验证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本书将对中国电视史研究的时段设定为1958—2008年50年的历史。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不但足以使我们对中国电视业独特的演进规律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观察,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资料的有效性。

在研究的框架上,本书主要借鉴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理论与方法。在该体系的开创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看来,话语的形态和变迁是历史演进的重要动力,对话语的深入考察可以解释构成历史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起源、主体和潜在的意义。<sup>②</sup>由于语言转译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意义流失,我们似乎很难在汉语中将福柯的discourse的含义界定清晰,但从福柯在《历史、话语和断续性》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来看,话语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可以被大致归纳为“合法化”:它通过语

<sup>①</sup> Andreas Fickers and Catherine Johnson (eds.), *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Histor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8.

<sup>②</sup> Michel Foucault, "History, Discourse and Discontinuity," in *Psychological Man: Approaches to an Emergent Social Type*, No. 20, 1972, p. 238.



言、知识生产、领域划分、身体控制等各种机制,界定了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来源,塑造出符合现代社会运转要求的主体,同时不断对意义进行着生产。在具体历史研究中,话语分析显然能够有效地弥补结构分析所产生的以偏概全、忽视文化的能动性 etc 缺陷;它尤其强调脱离自上而下的政治史叙事的窠臼,将社会中的流行观念、普遍性的看法以及普通人的声音放大,并视其为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事实上,经过对史料的爬梳和剖析,本书发现:正是在当代中国复杂而具体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三种鲜明的话语实践,最终成为推动电视史演进的直接动力。这些话语实践的生成和流变固然以特定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但它们在中国电视业连绵不断的发展中,已经成为具有高度自治性的观念体系与价值体系。本书认为,只有发现、厘清并理解了这些支配着电视业发展演进的话语构型,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该行业发展演进的本质规律。因此,电视史研究者不但应当重视对各类文献资料中的事实性内容的采集和归纳,而且要关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看待和谈论电视的方式。这种“看待”和“谈论”实际上就是主流的价值观念对电视业某些表象或特质加以“合法化”的重要方式。正是在这样具体而细微的言谈中,历史的细节得以汇聚成规律。

当然,必要的结构分析仍是我们在总体上对某一行业的一般状况加以把握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例如,鉴于中国电视自始至终所具有的鲜明的国有属性,以及从1978年开始逐渐在市场经济的侵袭和浸润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本书不可避免将在分析、阐释特定问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历史时段时,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在研究中主要体现在对于促进电视业追求、实现产业化转型的种种结构性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挖掘,以期透过表面现象,实现对电视产业深层逻辑的探寻。另外,带有建构论色彩的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电视业内特定现象得以出现和流行的原因做出解释。不过,本书不主张为理论而理论,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的终极目的,仍在于使对历史的呈现更为清晰,对历史的阐释更具说服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为使行文更为清晰,以及出于读者阅读之便利性考虑,本书将以如下体例展开对于历史的叙述:第一,语境层面(contextual level),即在电视媒介与诸种社会因素的勾连与互动之中,展开对于推动其发展演进的原因与效果的考察;第二,文本层面(textual level),即对